

企业家精神与区域经济增长

陈立泰,陈春丽,万丽娟

(重庆大学 贸易与行政学院,重庆 400044)

摘要:企业家精神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要素。文章基于2000-2008年重庆40个区县的动态面板数据,运用广义矩估计方法分析了企业家精神对重庆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整体而言企业家精神促进了重庆经济增长,并且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滞后效应;但进一步分析发现,企业家精神对落后的“两翼”区域的经济增长产生了阻碍作用,文章认为这是非生产性企业家精神在此区域活跃度较高导致的。因此重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充分认识到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的两面性,制定有利于生产性企业家精神发挥的政策体系和制度框架,以抑制非生产性企业家精神的发挥。

关键词:企业家精神;重庆经济增长;广义矩估计方法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11)03-0023-07

一、引言

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规模经济不再是全球经济的唯一主宰,创新和创业型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步加大。自此,企业家精神理论再次受到众多研究者的亲睐,并产生了许多有影响的研究成果^[1-7]。其中Baumol^[4]在继承熊彼得^[8]“创新理论”思想下,对古罗马、古中国等世界历史发展研究时发现:企业家活动对经济增长并非总是产生生产性的(productive)影响,还包括非生产性的(unproductive),甚至是破坏性的(destructive)的影响。Baumol将“企业家精神分为生产性的与非生产性的”的思想受到了许多研究者的关注,并对此进行了更深入的分析与研究^[9-10]。他们一致认为,只有那些具有生产性的创新型企业家精神才是重要的生产要素,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而非生产性的企业家精神对经济持续的发展将产生阻碍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民营经济的不断发展壮大,许多经济学者也从企业家精神的视角,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取得了不少成果^[11-12]。但在这些实证文献中并没有提及企业家精神非生产性的一面,而实证结果都表明企业家精神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这难道就说明中国的企业家活动都是配置到创新等生产性活动中,而没有配置到非生产性活动中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目前中国一些企业仍然是靠寻租、贿赂等手段争取生产资源。Baumol认为这样的企业家不是财富的创造者,而是对他人财富的再分配者。但是我们并不能否定这些文献的价值,原因有二:其一,要对生产性企业家精神与非生产性企业家精神进行准确分类并统计十分困难,即使是找两个指标对其进行衡量也极其不易。这也可能是导致此理论缺乏实证文献支持的直接原因。其二,按照Baumol

收稿日期:2010-12-05

基金项目:重庆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科研专项人文社科类项目“重庆企业责任竞争力治理机制研究”(CDJSK10027)

作者简介:陈立泰(1970-),男,四川南充人,重庆大学贸易与行政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产业经济与区域经济研究。

的理论,企业家的供给在社会中是非均衡的,而制度对企业家活动的配置发挥着决定性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体制日益变得更加有利于企业家活动配置到创新等生产性活动中,从而抑制了非生产性企业家精神的发挥。所以整体上看,企业家精神对中国经济增长作出了贡献,逐渐成为了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新要素。相似地,如果一个经济体或者区域内的政策、人文、地理等因素不利于生产性企业家精神的发挥,而非生产性企业家精神表现活跃,遵循已有实证文献的方法将会得出相反的结论,企业家精神会阻碍经济的发展。所以笔者认为,Baumol将企业家精神分为生产性与非生产性的理论思想,为解释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提供了新的视角。

众所周知,重庆不仅是西部的唯一直辖市,更突出的是它具有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特点,“一圈”和“两翼”^①区域经济差异十分明显。2008年,“一圈”区域的人均GDP为21745元,而“两翼”地区人均GDP为7918元^②。“一圈”和“两翼”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悬殊如此大,这不是只用交通、地理、经济基础等传统的比较优势所能全部解释的。笔者拟承袭熊彼特和Baumol为代表的“创新”学派的理论思想,从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的角度出发,实证研究企业家精神对重庆整体经济增长、“一圈”区域经济增长以及“两翼”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试图为重庆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提供新的解释思路。

二、企业家精神的内涵与测度

由于企业家精神的多维涵义,学术界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定义,经济学家们都是根据自己研究的侧重点不同而进行把握,因此要对企业家精神进行定量分析也相当困难。但是我们能从已有的实证文献中得到启示:寻找一个能极大包含和表现企业家精神内涵的指标对其进行量化。

笔者选取“劳均新建企业率”^③来测度企业家精神(用 E_{it} 表示),因为新建企业不仅能较好体现奈特、熊彼特和柯兹纳的有关企业家精神的理论思想^④,并且“反映了地区或产业动态的经济活力,和地区社会制度系统对市场进入行为的支持程度”^[13]。

笔者摒弃了李宏彬等^[7]将企业家精神分为创业精神和创新精神分别测度的思想。因为,虽然近年来中国科技创新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这些创新并不是以企业为主导,特别是像重庆这样的西部地区城市,如果将科技创新归属于企业家,目前有夸大区域企业家精神之嫌^⑤。

在做关于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时考虑企业家精神的内生性问题已是必然。因为,企业家精神现已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因素被理论界更多地接受^[3,6,14],并且在众多的实证文献中将企业家精神内生化后得到的估计效果更好^[7,12]。但基于稳健性,笔者同时考虑了企业家精神变量的外生性与内生性,分别进行了实证分析。而将企业家精神视为内生变量时,拟用企业家精神的滞后2期($E_{i,t-2}$)作为其工具变量,以克服内生性。

三、模型,方法和数据

(一)模型

在Audretsch等^[14]模型的基础上,于君博^[12]在解释变量中添加了各变量的一阶滞后项,建立了包含企业家精神变量的动态面板模型;而李宏彬等^[7]在稳定状态的经典增长回归框架下,加入了储蓄、制度等控制变量,建立了企业家精神变量的动态面板模型。笔者在结合二者的优点和充分考虑数据的可得性情况下,在C-D生产函数中加入了制度变量 Gov_{it} ^⑥,和笔者的研究重点企业家精神变量 E_{it} ,得到如下的动态实证模型:

$$\begin{aligned} \ln Y_{i,t} = & \ln A + \beta_1 \ln Y_{i,t-1} + \beta_2 \ln K_{i,t} + \beta_2 \ln K_{i,t-1} + \beta_3 \ln L_{i,t} \\ & + \beta_3 \ln L_{i,t-1} + \beta_4 \ln Gov_{i,t} + \beta_4 \ln Gov_{i,t-1} + \\ & \beta_5 \ln E_{i,t} + \beta_5 \ln E_{i,t-1} + u_i + v_{i,t} \end{aligned} \quad (1)$$

其中 $Y_{i,t}$ 是第 t 期实际总产出, $Y_{i,t-1}$ 是初始实际总产出, A 是技术进步因素, $K_{i,t}$ 是固定资产投资数, $L_{i,t}$ 是劳动力投入, $Gov_{i,t}$ 是政府支出, $E_{i,t}$ 是企业家精神, u_i 地区效应, $v_{i,t}$ 残差,下标 i 和 t 是区域与时刻,各变量的一阶滞后项都以 $\cdot_{i,t-1}$ 表示。

(二)估计方法

滞后一期的地区生产总值的纳入使被解释变量受到它的滞后一期的影响,会导致自相关问题,同时

①重庆“314”总体部署后,形成了“一圈两翼”的战略和区域格局。“一圈”是经济发达的“一小时经济圈”的简称,包括了主城区及周边等在内的23个区县;而经济、交通等落后的渝东北和渝东南,简称“两翼”,包括了巫山、秀山县等在内的17个欠发达区县。

②数据来源:《重庆统计年鉴2009》。

③等于每年新建的企业数除以就业人数。

④奈特(1921)认为企业家是不确定性决策者,是用于承担风险的;熊彼特(1934)提出的著名“创新理论”,注重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柯兹纳(1973)认为“企业家精神的本质是对以前未被认识到的机会的敏感性,是一种发现程序”。

⑤庄子银(2003,2007)也认为目前中国企业还是以模仿为主,鲜有创新。

⑥此变量现已广泛地出现在经济增长模型中,并且重庆处于西部地区,作者认为政府支出较大地影响了重庆的经济增长,纳入模型十分必要。

企业家精神也面临着内生性问题。这两个问题都将使 OLS, 2SLS, 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等估计量有偏且非一致, 即所谓的“动态面板估计偏误问题”。而工具变量法和广义矩估计却能解决这一问题, 因此也得到了广泛应用和较大发展。鉴于此, 笔者将采用在动态 panel data 估计中运用得最广泛的一阶差分广义矩估计(DGMM)和系统广义矩估计(SGMM)来对模型(1)分别进行估计。一阶差分广义矩估计(DGMM)是 Arellano 和 Bond(1991)综合了 Anderson 和 Hsiao 的对一阶差分后动态面板模型的工具变量估计和 Hansen 的广义矩估计的基础上提出的; 而 Blundell 和 Bond(1998)在 Arellano 和 Bover(1995)增加新的矩条件的基础上, 通过增加假设条件, 提出了系统广义矩估计(SGMM)^[15]。

首先, 为消除地区固定效应 u_i 的影响, 对式(1)进行差分, 得到:

$$\begin{aligned} \Delta \ln Y_{i,t} = & \beta_1 \Delta \ln Y_{i,t-1} + \beta_2 \Delta \ln K_{i,t} + \beta_2' \Delta \ln K_{i,t-1} \\ & + \beta_3 \Delta \ln L_{i,t} + \beta_3' \Delta \ln L_{i,t-1} + \beta_4 \Delta \ln Gov_{i,t} \\ & + \beta_4' \Delta \ln Gov_{i,t-1} + \beta_5 \Delta \ln E_{i,t} \\ & + \beta_5' \Delta \ln E_{i,t-1} + \Delta v_{i,t} \end{aligned} \quad (2)$$

在差分式(2)中, $\Delta \ln Y_{i,t-1} = \ln Y_{i,t-1} - \ln Y_{i,t-2}$ 与 $\Delta v_{i,t} = v_{i,t} - v_{i,t-1}$ 是高度相关的, $\Delta \ln Y_{i,t-1}$ 具有内生性, 因而需要寻找工具变量来解决这一问题。Arellano 和 Bond 认为 $(\ln Y_{i,t-1}, \dots, \ln Y_{i,t-2})$ 与 $(\ln Y_{i,t-1} - \ln Y_{i,t-2})$ 高度相关, 与误差项 $(v_{i,t} - v_{i,t-1})$ 不相关, 则都可作为 $(\ln Y_{i,t-1} - \ln Y_{i,t-2})$ 有效的工具变量。Arellano 和 Bond 通过增加新的矩条件, 从而增加更多有效的工具变量对其进行了改进。后来 Blundell 和

Bond 在他们的基础上提出的系统广义矩估计(SGMM), 其核心是在差分后的方程(2)的基础上, 增加了水平方程(1), 从而利用更多的矩条件, 即 $(\Delta \ln Y_{i,t}, \dots, \Delta \ln Y_{i,t-1})$ 和 $(\ln Y_{i,t-1}, \dots, \ln Y_{i,t-2})$ 分别用作水平方程(1)和差分方程(2)的工具变量, 对两个方程进行估计。由于 SGMM 估计通过增加水平方程获得了附加的工具变量, 被认为改进了效率^[15]。因此系统广义矩估计受到了许多关于动态面板模型文章的青睐。而于君博^[12]在运用此两种方法对加入企业家精神的动态模型进行估计时, 接受了 DGMM 的估计结果, 基于稳健性考虑, 笔者将分别采用 DGMM 和 SGMM 两种 GMM 方法对模型进行估计, 取其较优的估计结果。

(三) 数据

笔者模型分析的对象涉及了重庆市的 40 个区县 2000 - 2008 年的数据, 其中 40 个区县的生产总值、就业人口、固定资产投资和政府支出的数据来源于各年的《重庆统计年鉴》和《1997 - 2007 重庆及全国省市社会经济发展主要统计数据汇编》。而每年的新建企业数^⑦从《重庆经济普查》(2004)中只能得到 2000 - 2004 年间的数, 2005 - 2008 年的数据我们只能通过《重庆统计年鉴》提供的区县每年企业法人活动的单位数, 用两年数据相减得到的数据进行计算估计^⑧。表 1 是企业家精神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从中可以看出“一圈”区域的企业家精神的活跃程度明显高于“两翼”区域地区, 重庆企业家精神在不同区域的活跃程度的确存在极大的不平衡。表 2 是其他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 1 企业家精神自变量描述性统计

样本	变量	平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标准差	观测值
全市	lnE	1.008	4.921	-3.230	1.145	340
一圈	lnE	1.498	4.921	-0.591	1.001	196
两翼	lnE	0.342	3.439	-3.230	0.977	144

注: 新建企业数, 在 2005 年 - 2008 年期间缺失了少量的数据, 所以 E 变量缺失了少量观测值。

表 2 其他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变量解释	平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标准差	观测值
lnY	实际 GDP	3.817	5.795	1.571	0.837	360
lnK	固定资产投资	2.505	4.166	-0.221	0.966	360
lnL	就业人数	3.620	4.601	1.008	0.603	360
lnG	政府实际支出	1.779	4.049	-1.094	0.834	360

注: 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和政府支出都以 2000 年为基期, 以各自的平减指数进行了平减。

⑦数据中包含了国有成分的企业, 但是数据显示所占比例极小, 所以笔者没有对此数据进行剔除处理, 并且现在也不能否认企业家精神同样能以国有成分的企业为载体而存在。

⑧此方法不会高估企业家精神, 对笔者的研究目的不造成较大影响, 运用此数据是合理的。

四、估计结果

(一)企业家精神对重庆市整体经济增长的影响

由于地区效应的存在,用 OLS 估计的滞后被解释变量的系数 β_1 的结果会偏大,而用固定效应估计的 β_1 的结果会偏小,所以当用 GMM 估计时,如果滞后项的系数 β_1 处于混合 OLS 估计和固定效应估计值之间,则我们可以认为 GMM 估计的结果是合理有效的^[15]。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观察 β_1 的估值范围,判断 GMM 估计结果是否合理。基于此,笔者对构建的模型分别进行了混合 OLS、固定效应、两步 GMM 估计^⑨,并将回归结果列于表 3 第二列至第六列,其中第四列和第六列是将企业家精神视为内生变量进行估计,第五列是将企业家精神视为外生变量进行估计,用 DGMM * 表示(下文列同)^⑩。从表 2 中可知,只有第六列, T - step DGMM 对 β_1 的估计结果是位于可接受范围(0.937 ~ 1.003)之间的,因此我们将舍弃 T - step SGMM 和将企业家精神视为外生变量的

T - step DGMM * 对笔者的估计结果;并且第六列中,模型还通过了 Hansen 检验和残差自相关检验,即不能拒绝 GMM 下工具变量有效和一阶差分方程中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性的原假设($P > 0.1$);此外,资本和劳动投入变量也得到了显著的估计结果,并且符合理论预期,这说明 T - step DGMM 的估计结果是非常稳健的。

从以上稳健性分析表明企业家精神对重庆市整体经济增长表现为较显著的正效应,企业家精神促进了重庆经济增长;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企业家精神每增加 1 个百分点,将带来重庆当期经济增长 0.3 个百分点,下期经济增长 0.8 个百分点,企业家精神具有显著的滞后效应,这与于君博^[12]运用 Audretsch 等^[14]的模型对全国样本估计的结果 0.13 来说还比较低;而代表制度变量的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也表现出显著的正效应,得到了预期的结果,表明笔者模型加入政府支出变量是合理的。

表 3 全市样本估计结果

变量	OLS	FE	T - step SGMM	T - step DGMM *	T - step DGMM
$\ln Y_{i,t-1}$	1.003 *** (519.47)	0.937 *** (30.89)	1.012 *** (75.63)	1.010 *** (17.6)	0.982 *** (22.99)
$\ln K_{i,t}$	0.367 *** (14.59)	0.162 *** (10.85)	0.188 ** (3.48)	0.025 (0.54)	0.110 *** (4.12)
$\ln K_{i,t-1}$	-0.374 *** (-15.20)	-0.527 *** (-17.14)	-0.225 *** (-4.26)	-0.303 * (-2.75)	-0.455 *** (-9.51)
$\ln L_{i,t}$	0.093 *** (8.42)	0.098 *** (13.91)	0.040 ** (2.14)	0.017 *** (1.73)	0.014 *** (2.99)
$\ln L_{i,t-1}$	-0.086 *** (-7.37)	-0.008 (-0.80)	-0.008 (-0.42)	-0.18 (-0.91)	-0.016 ** (-1.83)
$\ln Gov_{i,t}$	0.005 (1.06)	0.003 (1.05)	0.047 * (2.77)	0.039 *** (2.00)	0.074 *** (5.98)
$\ln Gov_{i,t-1}$	-0.005 (-1.07)	-0.004 (-1.45)	-0.039 ** (-2.34)	0.006 (0.40)	-0.009 (-0.77)
$\ln E_{i,t}$	0.001 (1.53)	0.000 (0.27)	0.009 * (3.45)	0.002 * (1.99)	0.003 ** (2.41)
$\ln E_{i,t-1}$	0.001 * (1.61)	0.002 ** (3.36)	0.014 * (3.29)	0.016 ** (2.7)	0.008 *** (3.65)
Adj. R2	0.999	0.925			
Hansen test			0.752	0.026	0.123
AB test - AR(2)			0.512	0.998	0.146
面板描述	G = 40 T = 9 Obs = 291	G = 40 T = 9 Obs = 291	G = 40 T = 9 Obs = 291	G = 40 T = 9 Obs = 251	G = 40 T = 9 Obs = 251

注:(1)笔者通过 stata10.1 中的“xtabond2”程序对参数进行估计;(2)企业家精神 E 作为内生变量时,选择其滞后 2 期 Lag (2,2) 作为企业家精神的工具变量;(3)Hansen test、AB test - AR(2) 报告的都是统计量伴随的 P 值;(4)括号内为异方差稳健 t 值,*、**、*** 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的水平上显著。

⑨ Xtabond2 中,GMM 估计的两步法比一步法更加有效,所以笔者的估计用两步法。

⑩ 区域分析中析原理与此相同,就不再列出 OLS 和固定效应估计的结果。

(二)企业家精神对重庆“一圈”和“两翼”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差分广义矩估计(DGMM)方法对“一圈”和“两翼”区域的样本数据的估计结果,DGMM*表示将企业家精神视为外生变量的估计结果。

表4 一圈、两翼样本估计结果

变量	一圈(23个经济发达区县)			两翼(17个欠发达区县)		
	SGMM	DGMM*	DGMM	SGMM	DGMM*	DGMM
$\ln Y_{i,t-1}$	1.005*** (61.94)	0.970*** (13.17)	0.950*** (16.18)	1.005*** (41.47)	0.970*** (10.64)	0.940*** (11.90)
$\ln K_{i,t}$	0.241** (3.52)	0.540 (0.83)	0.133** (2.97)	0.345** (3.79)	0.102 (1.45)	0.145 ^{8*} (3.18)
$\ln K_{i,t-1}$	-0.268*** (-4.12)	-0.378*** (-3.90)	-0.470*** (-5.68)	-0.350** (-3.84)	-0.414*** (-5.27)	-0.433 ^{8*} (-4.26)
$\ln L_{i,t}$	0.037 (0.16)	0.016 (1.27)	0.010 (0.84)	-0.010 (0.64)	0.011 (1.30)	0.004 (0.61)
$\ln L_{i,t-1}$	-0.14 (-0.55)	-0.017 (-0.85)	-0.000 (-0.00)	0.012 (0.70)	-0.025 (-1.65)	-0.012 (-0.27)
$\ln Gov_{i,t}$	0.061*** (4.93)	0.067** (2.45)	0.087*** (5.50)	0.077** (3.31)	0.061** (2.25)	0.073** (3.47)
$\ln Gov_{i,t-1}$	-0.053** (-3.96)	0.003 (0.20)	-0.008 (-0.52)	-0.073** (-2.59)	0.007 (0.35)	0.008 (0.32)
$\ln E_{i,t}$	0.009** (2.19)	0.001 (0.81)	0.002 (1.00)	0.003 (0.91)	0.001 (0.40)	-0.000 (-0.14)
$\ln E_{i,t-1}$	0.008 (1.63)	0.012* (2.05)	0.006 (1.40)	0.008 (1.50)	0.008* (1.80)	0.005 (1.64)
Hansen test	0.991	0.061	0.850	1.000	0.136	0.996
AB test - AR(2)	0.943	0.514	0.005	0.878	0.954	0.831
面板描述	G = 23 T = 9 Obs = 169	G = 23 T = 9 Obs = 146	G = 23 T = 9 Obs = 146	G = 17 T = 9 Obs = 122	G = 17 T = 9 Obs = 105	G = 17 T = 9 Obs = 105

注:同表(3)。

对“一圈”区域的估计结果中得知:用DGMM时,拒绝了一阶差分中不存在二阶残差序列相关的原假设,企业家精神变量系数的统计性也并不显著;而当企业家精神为外生变量时,企业家精神变量系数值不但较小,统计性也不显著,并且其工具变量的有效性被Hansen检验拒绝了;然而SGMM估计时,虽然有些变量的系数并不显著,但是得到了预期的符号,并且模型通过了GMM估计的其他检验,因此可以认为SGMM的估计是稳健的。从SGMM估计

结果知道,企业家精神每增加1个百分点,将带来“一圈”区域经济增长0.9个百分点,下一年经济增长0.8个百分点,远大于重庆市的平均水平,“一圈”的企业家精神活跃程度较高。

对“两翼”区域的估计结果中得知:无论是DGMM还是SGMM方法估计的企业家精神变量系数值都较小,并且是弱显著性,这和“两翼”属于落后的贫困山区,企业家精神活跃度极低的理论预期是相符合的;此外,从表4中可以看出SGMM和DGMM*

的估计结果都不理想,一些变量系数没有得到理论的预期结果,因此笔者将着重报告 DGMM 的估计结果。值得注意的是,在 DGMM 的估计结果中,企业家精神变量的系数统计性虽不显著,但是得到了相反的符号,表明企业家精神阻碍了当前的经济增长。从计量的角度说,DGMM 的估计结果是稳健的,因为模型不仅通过了 Hansen 过度识别检验和 AB 序列相关检验,并且 $\ln Y_{i,t-1}$ 估计的系数 0.940 是位于混合 OLS 估计和固定效应估计区间(1.002,0.935)区间内的,其他变量的符号也符合理论的预期,GMM 估计是有效的。所以笔者认为,“两翼”区域企业家精神变量系数之所以出现了负的符号,这可能是因为“两翼”区域属于落后的山区,由于地理、文化和政策等原因使此区域非生产性的企业家精神活跃度较高^[4,6]。此类企业家通过寻租和犯罪等不公平手段获得机会或者资源,形成恶性竞争,从而阻碍了经济的长期发展。

五、结论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企业家精神已经成为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新要素。笔者选取“劳均新建企业率”来测度企业家精神,并将这一变量引入经济增长模型,运用重庆市 2000-2008 年的区县动态面板数据,首先分析了企业家精神对重庆市整体经济增长的影响,紧接着进一步分析了企业家精神对“一圈两翼”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实证分析时,笔者充分考虑了企业家精神变量的外生性与内生性,而将企业家精神作为内生变量时,选取其本身的滞后 2 阶作为工具变量,以克服内生性。笔者的估计结果显示:(1)总体而言,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企业家精神每增加 1 个百分点,将带来重庆整体经济增长 0.3 个百分点,下期经济增长 0.8 个百分点,企业家精神促进了重庆经济增长,并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滞后效应;(2)在经济较发达的“一圈”区域内,企业家精神每增加 1 个百分点,将带来“一圈”区域经济增长 0.9 个百分点;而处于落后山区的“两翼”区域,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显著性不高,甚至产生了负的影响。比较说明企业家活动的配置在“一圈”和“两翼”区域存在较大差异:“一圈”区域的生产性企业家精神比较活跃,因而整体上来讲,企业家精神对“一圈”区域经济增长贡献较大;而“两翼”区域非生产性企业家精神十分活跃,从而整体上来讲,企业家精神阻碍了“两翼”区域经济的发展。

笔者的结论对重庆的经济发展,特别是缩小区域经济差异具有一定的政策指导意义:整体而言,企业家精神变量对重庆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但是区域差异十分显著,在较落后的“两翼”区域,企业家精神阻碍了经济长期、稳定的发展。因而重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充分认识到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的中心地位,重视“生产性企业家精神”这一特定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制定和完善有利于生产性企业家精神发挥的政策体系和制度框架,抑制非生产性企业家精神的发挥,特别是在落后的“两翼”区域,以激励本地企业家的成长和吸引外地企业家的净流入,让企业家精神要素真正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引擎。

参考文献:

- [1] KIRZNER I M. Competi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3:1-168.
- [2] KIRZNER I M. Entrepreneurial discovery and the competitive market process: An Austrian approach[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997, 35:60-85.
- [3] SCHMITZ J A. Imitation, entrepreneurship, and long-run growth[J].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9, 97(3): 721-739.
- [4] BAUMOL W J. Entrepreneurship: Productive, unproductive, and destructive[J].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0, 98(5):893-921.
- [5] 庄子银. 南方模仿、企业家精神和长期增长[J]. 经济研究, 2003(1):62-70.
- [6] 庄子银. 创新,企业家活动配置与长期经济增长[J]. 经济研究, 2007(8):82-94.
- [7] 李宏彬,李杏,姚先国,等. 企业家的创业与创新精神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J]. 经济研究, 2009(10):99-108.
- [8] 约瑟夫·熊彼特. 经济发展理论[M]. 北京: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0.
- [9] MURPHY K, SHLEIFER A, VISHNY R. The allocation of talent: Implications for growth[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1(May):503-530.
- [10] ACEMOGLU D. Reward structures and the allocation of talent[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995, 39:17-33.
- [11] 鲁传一. 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的机制研究[D]. 北京:清华大学, 2000.
- [12] 于君博. 对企业家精神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机制的实证

- 研究[D]. 北京:清华大学,2007.
- [13] 肖建忠,唐艳艳. 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与经验研究综述[J]. 外国经济与管理,2004(1):2-7.
- [14] AUDRETSCH D B, KEILBACH M. Entrepreneurship capital and regional growth[J]. The 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2005,39:457-469.
- [15] ROODMAN D. How to do xtabond2: An introduction to “difference” and “system” GMM in Stata[Z]. Working Paper 103, 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 Washington, 2006.

Entrepreneurship and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CHEN Li-tai, CHEN Chun-li, WAN Li-juan

(College of Trad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P. R. China)

Abstract: The entrepreneurship has become the new element for Chi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Chongqing 40 counties dynamic panel data in 2000-2008, this thesis uses GMM method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entrepreneurship on Chongqing economic growth. The analysis result indicates that the entrepreneurship promotes Chongqing economic growth on average and has obvious positive hysteric effect on economic growth. However, the influence of entrepreneurship on regional variation is considerable. The entrepreneurship sets back the economic growth of under-developed “two wings” regions, and non-productive entrepreneurship is extremely active in these regions. Therefore, in the process of Chongqing economic growth, it should be well known the positive influence of entrepreneurship on economic growth. And Chongqing should establish the policy and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which is beneficial to implementing productive entrepreneurship and inhibiting unproductive entrepreneurial spirit.

Key words: entrepreneurship; Chongqing economic growth; GMM

(责任编辑 傅旭东)